

导言 后传统社会的问题域

第一节 后现代还是后传统？

吉登斯把今天的社会称之为后传统社会，而不同意把它称之为后现代社会。他指出，我们今天并未进入后现代时期，而是仍处于现代性阶段，^①因为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依然存在，并继续起着作用，只是今天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比以往社会更加剧烈和普遍罢了。^②《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的作者莱斯特·瑟罗把这种不确定称作“间断性平衡”。在他看来，这种“间断性平衡”是由共产主义的终结、人工智能产业化、人口的增长、流动和老龄化、全球性经济和没有大国主宰的多极世界这五种因素交织作用而引起的。在吉登斯看来，后现代主张显然是低估了现代性的复杂性，因此，它无法准确地把握现代性的发展本性，也无力真正发现现代性的内在问题，因而不利于社会生活实践和现代性的发展。为了与后现代区分开来，他提出了

^① 吉登斯对后现代性做了如下的评述：“我将把后现代性理解为远离或超越现代性各种机制的一系列内在变迁，我们还不是生活在后现代社会，但是我们能看到被现代制度所孕育的，且已偏离它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缕缕曙光。”（引自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52. 参见此书中译本《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6 页。）

^②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 页。

“后传统社会”概念。

那么,吉登斯为什么要把它称之为“后传统社会”呢?为搞清其中的原委,我们得先对“传统”这个词进行必要的考察。众所周知,传统这个词的内涵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演化。在英语世界中,传统这个词最初与拉丁文的 *Tradere* 相对应,其意思是指为保存某物而将该物传给另外一个人。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个词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我们现在所指的传统通常是指与现代性相关联,或者干脆把它称为现代性的产物。^① 传统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为此,吉登斯一再强调,传统之所以为传统,就是指它有别于现代。传统是对过去的定位。而作为一个流动性概念,传统本身是一个开放的动态体系,它被不断地重塑和改造。不受时代变迁影响的传统,即纯粹的传统是根本不存在的。吉登斯说:“认为传统一成不变,这是一个神话。”^② 传统本身以渐进的方式在不断演变。因此,传统并不意味着凝固不变,传统总是在变化之中。但他同时指出,传统具有抵御变化和强迫继承的特性,传统是“守护者”^③。社会的发展正是需要这些守护者,否则将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与传统是一种“断裂”关系。在分析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时,他提出了“断裂论”(discontinuity)的观点。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断裂。”^④ 但他指出,现代性与传

① 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0 页。

② Anthony Giddens and Christopher Pierson, *Conversations with Anthony Giddens, 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 Polity Press, 1998, p. 128. 参见该书中译本《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6 页。

③ 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性》,赵文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80 页。

④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 页。

统的“断裂”是一种特殊的断裂。他这样写道：“我所说的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传统秩序的类型。我认为，理解‘断裂’的性质，是我们分析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并诊断今天它对我们产生种种后果的必不可少的开端。”^①他把“断裂”作为理解现代性的切入口。

那么，现代性对传统所进行的“断裂”的特殊性集中表现在哪些层面呢？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对传统的“断裂”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现代性阶段，变迁的绝对速度是传统时代无法比拟的。第二，变迁涉及的范围也是传统时代无法企及的，现代性变迁已席卷整个地球。第三，现代制度是一种新型制度。现代正以这种前所未有的“断裂”方式，使我们远离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建构出一种崭新的社会生活秩序和图景。因此，也可以说，现代性是对传统进行“断裂”后的产物。

然而，令吉登斯大为遗憾的是：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却未能引起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的普遍关注。据他的解释，其中受社会进化论与历史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思想表示，人类历史发展受普遍性、必然性原则的支配，历史具有“总体性”特征和合乎因果规律的内在发展逻辑。对此，他给予了严厉反击，认为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在实践中也是不能成立的。而且他批评指出，正是受这些思想的影响，极大地阻碍了我们对现代性的深入认识。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吉登斯提出现代性与传统“断裂”的观点并不是想否认传统对现代的意义。换言之，他并不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没有自己传统的社会，或者说是传统完全消失的社会。对此，他做了特

^①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别强调：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在发扬传统和重构传统。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是既对立又融合、既制约又发扬的辩证统一的共生关系。现代来自传统。现代把传统与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它以实践方式与传统相连，又以理想方式来否认传统。传统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融入现代人的存在中，进而化作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传统的本质是真正的现代。传统从来不是作为现代人的身外之物，相反，它通过融入现代人的生活实践而获得与时代相映的规定性。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吉登斯在研究今天社会与传统“断裂”的同时，也特别强调稳定性、连续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社会复制是社会生活很重要的内容之一的观点。譬如，他提出我们的日常生活总是围绕着习惯或习俗，甚至是在重复过去的基础上建立而成的观点。在一次访谈中，他这样说道：“我不愿一味地谈社会变革，因为我们必须解释稳定和变革，或者连续性和变迁。”^①“变革和连续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直接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②更何况“在人类的绝大部分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持续性，而不是变迁”^③。吉登斯认识到社会需要相对平稳的系统、而相对平稳系统的建立又需要社会连续发展的道理。社会发展就是要求我们在连续与非连续、断裂与非断裂的发展中，寻求某种平衡。这里，传统就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若没有了传统这个依托，我们的思想与行动就没有了方向。而吉登斯的“断裂论”，只是想表明这样的基本立场：现代严重地“摧毁”了传统，这个传统被摧毁之后的社会是一个与传统

① 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托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66页。

性质与样态发生了很大变异的世界。

概括地讲,在吉登斯看来,今天我们仍处于现代性的发展阶段,至多只能算是一个特殊的现代性发展时期,只不过今天的现代性的变迁速度与程度较以往社会发展要快得多、深得多,甚至可以说与传统和以往的现代性正发生着剧烈的“断裂”,与过去相比显出很大差异:“以传统存在的传统越来越少”^①。然而,正如前面所言,今天的社会仍然没有放弃或背离传统,也没有放弃或背离现代性的总体性特征;相反,今天的社会需要从传统和以往现代性中汲取营养,以它们提供的基本框架为框架,来保证社会生活的连续性、稳定性。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与理解,吉登斯得出今天的社会是“后传统社会”而不是“后现代社会”的结论。

作为后传统社会,吉登斯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开端与终极并置的社会,是一个行为与经历全新的社会世界:“这种社会秩序是一个全球社会……是‘模糊空间’意义上的社会”。^②也就是说,后传统社会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线,不再是一个民族社会,而是一个全球秩序的社会。在这个秩序中,世界性人类对话正在形成;全球化的秩序正在形成;现代与传统正在发生“断裂”;反思性正在成为一种制度,并日趋强烈地影响和重构着我们的社会和日常生活秩序;自然正趋于非自然化。总之,整个世界,从个体到社会,从村社到全球,正在经历一场全面深刻的变迁。对此,著名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我们生活在民族国家、阶级、种族和传统家庭正

^① 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② 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3—134页。

在衰微，个人的自我实现和成就的伦理正变得日益流行的现代社会中。”^①这的确是个追新猎奇、机会不断、让人振奋的世界，但同样也是个问题不断、充斥着各种人造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惊心动魄的世界。吉登斯把这个世界又称为分裂和联合的矛盾体。

后传统社会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既分裂又联合的矛盾体，关键在于全球化与反思性以及它们的交织作用。吉登斯认为：“后传统社会是第一个全球社会。”^②他把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甚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发生的事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之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③也就是说，它使遥远的事件变得不再陌生，且带有很强的冲击力，冲击着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甚至深入到个人的日常生活领域中。如今个人与全球紧密关联。个人的是全球的，全球的也是个人的。这正如他所说，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决定，都将给全球带来影响。全球化使彼此的依赖程度较以前大大地增强了。对此，贝克也表示了赞同。他说：“全球化的概念是指世界的时空压缩以及增强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这样的概念反映了人类在追求改善生活状况的过程中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与关联性……民族国家的文化、经济与边界正被解构。”^④但无论如何，全球化离不开本土化，

^① Will Hutton and Anthony Giddens, *Global Capitalism*, The New Press, 2000, p. 165.

^② 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22 页。

^③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6—57 页。

^④ 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现在与未来——与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2 期，第 7 页。

在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需要关注本土实际情状和发展需求。因为,全球化是本土与外来、一元与多元的统一。全球化既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价值观念和市场机制的某种趋同化,同时又是一种充斥特殊化、多样化、异在性的发展。因此,世界的全球化加剧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而这种复杂性和多变性则必然会加剧整个全球社会的风险和不确定。贝克似乎早就洞见到这一点,指出全球化的最大后果是风险与不确定性。正是源于此,他干脆把今天的社会称为“风险社会”。吉登斯认为贝克的这种表述真是精确到至极了。^①总之,这是一个充满歧义纷争、风险与不确定相互缠绕的变动不居、扑朔迷离的世界。

那么,全球化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呢?齐格蒙特·鲍曼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这本书中如是说:“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然而,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②这就意味着,首先,全球化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风险系统,我们每个人都被置身于由全球化所带来的不确定的风险后果中。其次,全球化给每个人所赋予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一些人来说,全球化为他带来了亘古未有的大机遇,自然,全球化成了他的福祉;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可能就是一个陷阱,从此使他陷入到阴森恐怖的地狱之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全球化使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迁:从日常生活、工作到政治领域,全世界都能感

^① 参见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6页。

^②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

受到它的影响。特别是对个人而言,全球化不仅重构了个体的身份、认同、生活方式、生活目标,而且使个人的家庭生活、性、情感等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样,全球化就大大加剧了社会经济生活的风险系数和生活的动荡感。

然而,在吉登斯看来,后传统社会不仅是第一个全球化社会,而且还是一个高度反思性的社会。他把高度反思性看做是现代性动力机制之一。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有三个动力机制:1. 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2. 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3. 高度反思性机制(High 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他认为这三个机制互相关联。

时空分离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吉登斯非常重视时空问题。他这样写道:“在我的大多数著作中,我都已经强调必须把时空带到今天社会理论核心位置的观点。”^①因为按他的理解,今天所有的社会系统都通过时空进行延伸,而时空的延伸对社会的整个形态将产生深远的影响。^②在前现代时期,时空总是保持一致的,社会生活的活动时间与场所相互结合的程度较高。人们的日常生活通常与一定的场景密切相联,活动的场所也相对固定、熟悉,生活重复程度很高,个人长期被束缚于乡土、社区、宗教、行会、家庭等社会关系中。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固定在狭小的地区和社会空间中,使个人间和群体间在生存方式上具有同质性。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时期,时空延伸不很明显,人们的时空活动范围相对固定,生活具有较高程度的确定性和预见性。而随着现代交通工具与通信业的惊人发展,现代

^① 转引自 David Held and John B. Thompson, *Social theory of modern societies: Anthony Giddens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75.

^② Kenneth H. Tucker, JR, *Anthony Giddens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Sage Press, 1998, p. 113.

时空间的分离化现象就异军突起。现代人的社会交往方式、方法已今非昔比，遍布在地球不同角落的人几乎在同一时间里获悉某一地点发生的事件，并且与遥远的他者交往也变得异乎寻常的便捷。总之，时空的这种变化为社会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时空活动场域。

至于抽离化机制，就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起来的关联中‘脱离出来’”^①。吉登斯把抽离化机制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它们分别是象征符号 (symbolic tokens) 和专家系统 (expert system)。象征符号是指相互交流的各种媒介在不考虑个人或团体的具体特性的情况下，将信息发散到任何特别的场景中。吉登斯认为，货币是比较典型的象征符号。现代货币已经从具体的商品实物形态中独立出来，“以纯信息的形式显现出来”^②。因而，货币使交易能脱离具体的场景或特定的时空维度，以致在时空倒错的情景下，使交易得以实现。而专家系统“指的是由技术成果和专业知识构造而成的系统，这种系统是我们今天生活所需的巨大的物质和社会环境”^③。今天，我们被置身于一系列的专家系统中，正是出于对这些专业知识的依赖，使我们在对专业知识一无所知的情景下，也能感到相对安全，并勇于担当起风险。

吉登斯认为，时空分离与抽离化机制两者是一种互动关系。时空分离为抽离化机制做准备；抽离化机制又极大地扩展了时空延伸的范围。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在大大拓宽人的生存空间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与交往方式。然而，在后传统社会，又把现代性的这些动力机制推向了极端，使得时空的分离和抽离的速度及

①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 页。

② 同上书，第 22 页。

③ 同上书，第 24 页。

程度都将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一切又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反思性的发展,使整个社会进入到一种高度反思的状态。因此,后传统社会又叫高度反思性社会。高度反思性社会,使“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进而在结构上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特征”^①。这就是说,高度反思性引发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结构的极大改变。而这种结构性变迁,必然会对个体的生理、心理、情感、审美等内在机制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致使个体、自我、身体甚至性都由于持续不断的反思而获得重塑。

由此可见,由于受全球化和以时空分离与抽离化机制为基础的高度反思性的强烈影响,后传统社会陷入了高度的震荡与变迁之中。这种震荡与变迁必然注定后传统社会是一个充满诸多矛盾的社会系统。而矛盾必然滋生问题。

第二节 后传统社会的问题域

任何社会都有它特定的问题,后传统社会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后传统社会作为一个变迁程度和速度较以往任何社会都剧烈的社会,它的问题域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其中,许多问题都是亘古未有的,并且其后果也将是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吉登斯把后传统社会的问题归纳为下列几个方面:

一、人造风险

吉登斯把后传统社会的最大特征概括为对理性主义的普遍怀疑

^①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和对科学技术的双重认知,以及时空的急剧分离化、抽离化与高度反思性现象,而这一切必然意味着它对过去的急剧“断裂”。这种与过去的“断裂”,意味着为重塑社会和个人生活创造了条件,进而重生新的机会。但“断裂”在给我们带来新的机遇的同时,又造成了风险与危机的各种参数,从而极大地增长了风险与不确定性。为此,他把风险看做是理解现代性特征的一个关节点。在《失控的世界》一书中,他这样说道:“我希望说服你,使你相信,这个显然非常简单的概念却能说明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①风险表征了后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奥尔特加把它描绘成:“这是一个深奥的、可畏的、无穷无尽的、无法预测的世界,在这里一切都是可能的,不论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这个时代比其他时代优越,却又自觉卑微,它的确是强健有力的,却又对自己的命运把握不定,它对自己的力量引以为豪,却又对此惊惧不已。……一个志得意满的时代往往在其深层意义上已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悲剧感”^②。或许,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吉登斯指出,在中世纪以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概念。若是遇到诸如风险意义上的事,他们通常使用运气、命运或者上帝的意志等概念来表达。直到16世纪和17世纪,西方探险家才开始提出风险这个词,其意思是指航海家们航行到了未知的水域。后来这个词被渐渐用在与保险业有关的事务上。而吉登斯却赋予风险这一概念以特定的内涵。他强调,风险不同于冒险和危险。危险一般是指能

^① 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②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刘训练、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够被准确定位的、且能够采取措施避让的危害，并且危险作为危险，总是来自外部；而风险则与危险完全不同，“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的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①。然而，由于未来是难以预料、变化莫测的，而且，置于风险状态中的事物已失序，带有很大的任意性，即它使事物变得极为混乱而使原有规则不再适用。再者，风险一般是与我们人自身的行动相关，是人为的结果。此外，风险作为风险，通常不可能完全消除。因而风险使事态发展后果变得不再能被预见，一切均显得始料不及，而且也难以控制和消解。也就是说，风险使我们无法知道事态发展的方向和持续性的后果，更不消说对风险进行预防、控制和消除了。而这些风险特征却是任何风险都具有的普遍性特征。

后传统社会作为与过去“断裂”后的产物，它指涉未来。而“未来日益被认为其本质是不可知的，并且越来越与过去相分离。与此同时，未来成了一个新领地，一个反现实的可能性领地”^②。所以，吉氏根据风险概念的基本特征，并对照后传统社会的内在特征，而与贝克一样，认为今天的社会是个风险社会。

当然，我们知道，任何社会都存在着风险，“但风险社会制度是一种新秩序的功能：它不是一国的，而是全球性的。它与管理和技术决策过程确实存在内在关联。风险以决策为先决条件”^③。也就是说，风险社会的风险是全球化的和强烈的，它向世界扩散，每个人都

① 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②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8页。

③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被迫进入风险状态,没有人能幸免风险的威胁。例如,2003年波及全球的萨斯(Sars)就是一个极好的明证。这说明,风险已超越特定的时空和领域,其波及范围之广、领域之宽,令人咋舌。而且诚如贝克所指出的:风险社会的风险不仅仅限于环境和健康风险,它还涉及传统与现代交替变革所引发的风险。如个人自我认同的变革、家庭模式和观念的改变、个人民主意识的强化、职业模式的新异等情况所引发的种种风险。贝克把这种现象称为“冒险的普遍化”。卢曼把当代风险视作普遍存在的日常现象。他说:“我们始终生活在一个‘一触即发’的形势当中,无论做什么,我们要承担风险,我们的决定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更好或更糟,但要考虑到所有方面,我们的决定就不可能完美无瑕或最好。”^①除此之外,这种风险还是与人的决策和目标、与人的管理和技术直接相关,甚至可以说,就是它们的产物。因此,后传统社会风险完全不同于以往社会的风险。其中最突出的差异在于:以往社会的风险,主要是一种来自于外在的风险与危机;而后传统社会的风险,是一种强烈得多的人造风险。

据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后传统社会的风险特征概括如下:第一,风险既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贝克把它称之为“全球本土的”。第二,这是一种人造风险。第三,风险无处不在,生活与风险并在。第四,风险与政治内在关联。第五,这种风险靠个人根本无法抵御,甚至团体、国家也无能为力。第六,这种风险不能具体地归咎于哪个个人或团体,而是一种无人能负责的风险。

那么,后传统社会这种特具一格的风险,具体源于何处?吉登斯认为,后传统社会的风险和危机的主要来源有:对人类生存构成严重

^① 齐格蒙特·鲍曼:《寻找政治》,洪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威胁的高强度意义上的全球化过程所引发的风险,如全球化劳动分工变化等突发事件所引起的全球化风险;自然非自然化的风险;对大众产生影响的制度化风险;由不确定性所引发的风险;由有限的专业知识所致使的风险。吉登斯认为,这些风险的产生不单纯源自技术问题,而且还由严重的政治和道德问题所致。但无论如何,如前所述,这些风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由人为造成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风险不是我们所能弥补的,因为当我们在弥补风险的过程中,又会以一种更高昂的激情去制造风险。对此,卢曼也持这样的立场。他指出,人们原以为随着人类知识的扩大、技术的提高、理性法则和社会制度的完满化,就可以进入安全的避风港,然而,事实正好相反,这些东西非但没有使人类减少危险和灾难,反而使人面临更多的风险。因为这种风险本身是社会不断自我分化的结果,是现代性社会技术、文化的结果。

上述这些风险特征和来源必然注定已有风险规则的失效,而已有风险规则的失范又增加了对它加以预测和控制的难度。要对这样的风险做出评估就更加困难了。因为对这样一种风险做出评估本身就是一个内含风险的行动,况且,许多类型的风险是完全不能得到评估的。然而,并不是说,由于预测、控制、评估风险的难度之大,我们就可以放弃任何努力,坐以待毙。因为能否应对这场风险危机,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此,积极应战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二、道德缺失:人类精神的颓废

吉登斯认为:“所有传统都含有标准化或者道德的内容。”^①传统

^① 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陶传进、徐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具有道德规范的功能,对道德和情感都具有约束性。传统“具有包含道德和情感内容粘合的力量”^①。传统以隐约的方式给我们生活以示范,使我们清楚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我们可照着先人们存积的经验去行事。然而,一直以来,由于受现代工具理性思想方式的指导,迫使这种与现代工具理性和现代机制格格不入的传统道德陷入毁灭的境地。与此同时,由于现代工具理性导致了“经验的存封”(The Sequestration of experience),又加剧了价值和道德的沦丧(具体原因见第四章)。^②所以,后传统社会道德几乎处于真空状态。

这个道德沦丧的世界,预示着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的来临。每个人都忙于控制或超出别人,人丧失了固有的人性维度,整个世界失掉了精神的支撑:肉身的失重,灵魂的玄妙,自我与身体、身体与世界断裂后所引发的恐惧,使一切都显得阴森可怕、虚无缥缈,除了惧怕、空虚与失落,便一无所有。而空虚与无意义感,又使人屈从于贪得无厌、无穷无尽和自相矛盾的欲望之中。整个社会都倾向于“把外部事件与自我的需要和欲望联系起来,它只是追问‘这对我意味着什么’”,^③它热衷于体验自我实现所带来的欲望满足感,而较少顾及自

^① 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陶传进、徐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② 对于“经验的存封”,吉登斯没有给出过定义,他只是对概念进行了一个外在性的描述。他说:“现代性有着与社会再生产和自我认同相关联的控制取向,这两种取向在道德经验的层面上有一定的特殊后果。我把这些后果统称为经验的存封。”根据吉氏的说法,我们不妨做这样的理解:“经验的存封”就是把那些在过去与我们日常生活休戚与共的事物和情景,通过一种人为的方式,从我们生活中分离出去,并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施行特殊的管理和控制,由此引发道德层面的一系列严重后果的结局。

^③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8页。

我的行为给他人的感受,从而把自身的尊严和对社会的责任抛置脑后,以致使以享乐为目的的消费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在这个消费主义的社会里,人成为为消费而生存的营生,人被消解在物中。

总之,现代人把本属生活世界的意义完全给抽空了,人处于现代商品世界的威胁下,彻底失去了内在的道德感和责任意识,过着可怜又可悲的肉身放纵的“舒适生活”。援用卢梭的话说就是:现代生活给予人一个“破碎的灵魂”。吉登斯认为,生活的无意义感、生命的不确定感、生存的孤独感、存在的不安全感、交往的无信任感等等生存性焦虑和本体性不安全感,正肆意吞噬着当下人的“肌体”,人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生存困境。

三、信任缺失:本体性不安全感

对于信任,吉登斯把它定义为:“在一系列的后果或事件中,对一个人或系统的可靠性的信心,这种信心表达了对另一个人的德性或爱,或者说,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的信念。”^①信任是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本体性安全感要依赖于基本信任所提供的情感安全,即本体性安全感需要信任为其提供基本保障,否则,就属于本体性的不安全。

而熟悉是信任的基础,理应也是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与保障。如果说“本体性安全是指理所当然的常规的安全性,它体现了存在连续性的意义”^②,那么,本体性不安全感就是由于缺乏自我经历的一致性感受而引发的一种强烈的无所适从感,甚至沉沦的痛苦情状。

^①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② 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文军、赵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

当一个人周而复始地生活在日常惯性式的生活场景中,也就是说,在生活情境变动不大、一切均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人事变化都在自己预见的范围内、基本能预测到明天会发生什么、并且对自己的生活场景非常熟悉的情景下,人就会有一种基本信任感。这也就是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乐意跟熟悉的人和事物打交道,以及希望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的原因。然而熟悉、了解和建立基本信任感,实际就意味着获得一种连续性、可预见性和确定感。而要获得连续性、可预见性和确定感,就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体系和日常生活秩序。为此,吉登斯认为,传统就是我们建立信任感的最好基石。因为“传统就是重复”^①,它给人以连续和确定感;同时,“传统是认同的一种载体”^②,通过对传统的认同,使传统以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融入我们的生活中,这样基本信任就有了基础。

然而,我们知道,现实生活并不总是稳定的和熟悉的,而且生活情景也并不始终处于当下在场性,而是会时常碰到那些不曾出场的人事场景。特别是在后传统社会里,由于时空的高度分离和抽离,由于抽象系统的不断强化和社会的高度反思性,再加上社会对传统“经验的存封”,使得传统的东西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生活。这样一来,一方面,使得现代人的交往成为一种稍纵即逝式的交往,人处于不断的流变中,今天的生活情境与昨天的生活情境不同,明天的生活图式又与今天的有明显的变异,人事变迁,日新月异;另一方面,由于与传统的断裂,稳定的社会体系和生活秩序已不复存在,生活缺乏连

^① 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4页。

^② 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陶传进、徐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